

晋察冀边区统一战线研究问题述论

——对近20年相关文献研读的学术思考

赵心宪

(重庆市文史研究馆/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巴渝文化名人研究所, 重庆 400067)

摘要:“晋察冀边区统一战线”与“晋察冀边区的统一战线”作为学术概念的内涵不同,主要在于历史时间的设定与历史文化不同阶段的表现;近20年有关聂荣臻晋察冀边区统一战线实践研究的不足,主要在于历史时间与历史文化的含混;彭真与聂荣臻有关边区统一战线的工作报告都有毛泽东统战思想应用的实践理性特征,具有不可替代的中国革命史文献价值;聂荣臻晋察冀边区德治实践的理论源头,在于毛泽东的德治统战思想。

关键词:晋察冀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统战思想;德治实践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20)03-0005-05

一、问题的提出

为方便学术研讨,本文将“晋察冀边区统一战线”与“晋察冀边区的统一战线”两个概念加以界定后区别使用。“晋察冀边区统一战线”,特指抗日战争初期由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军区,以“军事斗争为中心”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遵循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于1938年11月前初步建立晋察冀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1937年10月27日,聂荣臻奉命率所部3000余八路军官兵,留守山西五台县筹备建立晋察冀军区,至11月7日晋察冀边区正式创立。边区部队很快相继收复晋东北、冀西、冀中和察南等40余县。1938年1月15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选举成立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标志着晋察冀边区的正式形成”^[1]。聂荣臻回忆,当时出席会议的国共代表有149名,分别从深山、平原,游击区、敌占区跋山涉水赶来参会,“共商抗日救国大计”。为期6天的会议通过了统一全区军、政、经、文,以及民运工作共7个议案,选举产生“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取得的巨大成果”^[2]。

“晋察冀边区的统一战线”,特指聂荣臻《关于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基本经验》中所总结的“十条”精要:依托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进行游击战

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创建根据地;党的政策是决定因素;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方针“不断发展和壮大人民军队”;加强、巩固与保证群众占优势的抗日政权;根据地的巩固扩大并兼顾“波浪式发展”;根据地的全面斗争,“具有为日后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提供雏形的深远意义”;“经济政策和锄奸政策”不允许出任何偏差;“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党组织成为人民抗日斗争的坚强领导核心”^[3]。值得注意的是,“晋察冀边区的统一战线”这十大经验中,包括了彭真在晋察冀边区贯彻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实践理性成果的特别贡献。笔者认同这样的论断:“统一战线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萌生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经过不断总结,逐步形成和发展于抗日战争时期。它的形成凝聚了全党集体智慧。”^[4]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史实提供的相关信息:其一,1938年1月8日,彭真在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分会扩大会议上发言指出:“只有与敌人的斗争中才能发展,要避免与友军摩擦,友军困难时应去拉他一把。”^[4]其二,1938年2月中旬,彭真开始在晋察冀边区工作,8个月以后中央决定以彭真为书记,聂荣臻、关向应、程子华为委员,组成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标志着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初步建成”^[5]。其三,1938年4月上旬,彭真在山西省五台县金刚库村主持晋察冀边区第一次党代

收稿日期:2019-11-12

作者简介:赵心宪,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巴渝文化名人等。

会,就如何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领导权提出基本思路和原则方法。其四,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彭真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了关于晋察冀边区工作的报告。10月5日全会主席团致电晋察冀边区,“完全同意边区党委所执行的坚定的统一战线方针”^[4]。其五,1938年11月,聂荣臻关于创建晋察冀根据地“有根有据”地阐述边区初创一年各项成就10万字左右的军事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毛泽东指示修改成书并题写书名“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1939年1月)^[1]。

不难发现,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武装斗争与统一战线建设形成了特别关联,聂荣臻因其身兼边区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在晋察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巩固过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很大影响,近20年受到了国内学界的特别关注。但是,因为没有注意到“晋察冀边区统一战线”与“晋察冀边区的统一战线”这两个概念所指史实内涵、历史时间的实际区别,晋察冀边区统一战线研究存在时段所指的混淆,影响了当下相关学术研究的深入。本文通过梳理有关研究文献的基本内容,探讨其问题所在,并对聂荣臻晋察冀边区的“德治”实践进行初步探讨。

二、相关学术成果述评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聂荣臻军事思想研究”(02BDJ001)成果之一的《聂荣臻对创建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的贡献》(2007)作者认为,聂荣臻为晋察冀根据地建立、巩固和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包括“政治上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军事上发动群众参军、改造杂色武装”,“经济上实行减租减息、发行边区货币、发展生产”,“文化上兴办教育,发展新闻出版事业,鼓励戏剧创作”^[6]等。该文参考了三种文献:《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和《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在笔者看来,该文的基本思路 and 主要论断,实际依据的是《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一书提供的核心观点和基本材料。也就是说,与“晋察冀边区统一战线”概念内涵的历史时空基本对应,边区进入相持阶段及以后统一战线的发展成就(特别是边区的文化建设成就),实质上并没有进入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例如,论述创建晋察冀根据地的政治贡献,先引用毛泽东书序中关于根据地“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的政治评价,接着引述王稼祥序言中的相关具体说明,然后分别阐述根据地抗日政权的建立、民众

积极性的调动,相关材料也都是《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一书提供的。关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作者直接引用书中原文“当我们首先到达晋东北的时候……帮助部队从事抗战动员”,而对《聂荣臻军事文选》与《聂荣臻回忆录》有关论断的引述仅为补充说明。例如,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之后,“边区数十个县一千多万的人民,获得了政治上的领导”等引述,出自《聂荣臻军事文选》第59页,发动群众成为边区“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巩固的‘奥妙’所在”等引文,则出自《聂荣臻回忆录》第408页。再如,论述晋察冀边区的经济问题、有关减租减息政策、边区货币发行、发展生产的经过时,先直接引用毛泽东《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序中的论断,随即引述王稼祥序中有关“晋察冀边区实行民生主义”的论述,并对此作进一步说明。有关史料主要是1938年2月晋察冀边区政府颁布的《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规定的“二五减租,一分减息”政策,边区政府颁布的《奖励生产事业条例》《垦修滩荒办法》,1938年初组织合作经济与颁布《合作社暂行规程》(1939年)等。

《聂荣臻与晋察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010)。尽管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建设、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是“三位一体”的战略关系,但统一战线建设是居于第一位并贯穿始终的核心问题。该文似注意到上述论文的不足,开篇即提出聂荣臻特别重视统一战线工作,“注重根据地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综合力量的建设”,因为边区“具有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雏形这样一个广泛而深刻的性质”^[7]。该文作者依据《聂荣臻回忆录》和《聂荣臻军事文选》,认为聂帅对边区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认识深刻,并在实践中努力践行,包括将统战思想落实到土地政策和抗日民族政权建设中、实行统一战线的军事战略、争取“统一战线下外国友人的援助”等。例如,该文阐述“军事上的统一战线”,主要以晋察冀边区创立之初对地方杂色武装的“统战”为个案,引《聂荣臻回忆录》针对不同性质的武装采取不同的政策及其所做的“统战”工作,即对抗日志士和人民群众组织的抗日武装等^{[8]423-424}。应该说,该文以陈述史实的方法,阐述聂荣臻在晋察冀边区初创时期(1937年11月—1938年11月为主要时段)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实行根据地的土地政策、建设抗日民族政权、形成边区军事上的统一战线、有效争取国际援助等方面的贡献,非常有说服力,但因为局限于“晋察冀边区统一战线”

概念特定的时段史实,或者正是选择了这一理论视角,晋察冀边区文化建设统一战线的成就被该文忽视了。相关论述缺失,也为后继研究者提供了有关聂荣臻晋察冀边区文化统一战线践行研究的学术选题。

《聂荣臻对晋察冀边区文化建设的贡献》(2014)^[9]。该文从分析晋察冀边区初创时期的重重困难切入,提出要特别重视“聂荣臻边区文化建设深邃思想”实践对边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的战略指导意义。该文作者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认为聂荣臻晋察冀边区文化建设的战略思想是以成体系的形态存在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强调了文化建设和文艺工作在战争时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第二,“将文化建设事业纳入边区的《施政纲领》”;第三,“致力于边区学校教育的恢复和改造”;第四,“大力发展边区的新闻出版事业”;第五,充分发挥戏剧等文艺形式的战斗作用。这五个方面应该是聂荣臻晋察冀边区文化建设战略思想体系的内核所在。诚如该文概括《聂荣臻回忆录》第482页内容所论,根据地的建设,在民主政治建设、政权机构改革、经济政策规划、人民生活改善之外,还应突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9]。该文的亮点在于,首先,对聂荣臻晋察冀边区文化建设战略思想的提出与探讨,是研究者立论参考文献自觉扩展的积极结果。该文参考文献除《聂荣臻回忆录》《聂荣臻军事文选》《聂荣臻传》外,还包括《聂荣臻年谱(上)》(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聂力《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潘振武《战歌春秋》(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等纪实文艺类出版物。其次,对《聂荣臻回忆录》带着学术问题的全面细读,对《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1940)的文化战略意义的重视。这一收入《聂荣臻回忆录》的历史文献,是边区于1940年8月正式公布的,因为刚好20条,所以简称《双十纲领》。正如研究者所说,这个纲领是聂荣臻领导晋察冀边区的施政纲领,相关文化事业建设的“条款”,是边区文化建设“施政的准绳”^[9]。晋察冀边区1940年8月正式公布的《双十纲领》,其特别之处在于体现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精神。新民主主义是毛泽东于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中提出的,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发表于1940年2月2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同年2月22日

在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第98、99期合刊登载时,改题为《新民主主义论》。简言之,聂荣臻晋察冀边区文化建设战略思想的形成,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哲学思想的抗日根据地实践,与晋察冀边区创建初期施行的“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的文化策略比较,有了明确的战略目标调整。准确地说,应该是聂荣臻在边区创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的重要发展。因此,《聂荣臻对晋察冀边区文化建设的贡献》一文突破了“晋察冀边区统一战线”概念的历史时间限制,将其延伸到“晋察冀边区的统一战线”概念的历史时段,全面进入抗战的历史文化空间。只是这篇论文没有进一步展开相关文化政策思想源头的探讨,学术研究的深度明显受到影响。

《聂荣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践行与发展》(2016)。该文认为,聂荣臻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通过在晋察冀边区八年的“践行与探索”,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这种战争中的统一战线建设经验,至今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10]。尽管该文作者希望以抗战八年的史实为基础论证上述结论,但文中所论与晋察冀统一战线建设“相结合”的五个方面,即与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军事斗争、土地政策、经济文化、争取外援相结合,笔者发现只有第四和第五部分史料个别延伸到抗战相持阶段以后,前三部分史料均出自《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和《聂荣臻回忆录》。问题还在于,该文所有引文都没有注明出处,不是规范的学术表达。笔者觉得,这篇论文似乎在提醒学界,晋察冀边区统一战线研究遇到了难以突破的学术瓶颈。

三、两个工作报告的比较阅读及其经验理性共同特征的思考

《毛泽东统战思想特征及其启示》(2015)^[11]提出毛泽东统战思想形成、发展的五阶段特征,这个学术创见是值得学界重视的。该文认为,毛泽东统战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发表于《湘江评论》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所提出的民众大联合是“改造中国的根本方法和必由之路”,是毛泽东统战思想生成“萌芽”期的开端。第二阶段,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毛泽东通过在地方调研,在获取中国国情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表明毛泽东统战思想“发展期”的基本理论框架已经形成。第三阶段,1931—1939年是毛泽东统战思想的初步“形成期”,主要史实为“闽夏”事件中坚持反蒋

抗日联合阵线、瓦窑堡会议上发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西安事变发生后提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主张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共产党人〉发刊词》提出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的著名论断,成为毛泽东统战思想基本形成的理论标志。第四阶段,1940年后为毛泽东统战思想的“再发展期”,主要体现在其先后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论政策》等文中,对抗战初期的三民主义建国策略,做出适应中共领导下抗日根据地发展前景的根本调整。第五阶段,毛泽东统战思想的“成熟期”则以《论十大关系》(1956)的发表为标志,长期坚持与发展统一战线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国策^[11]。与之相对应,有关晋察冀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两个权威工作报告,即聂荣臻的《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1939)与彭真的《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1941),正处于毛泽东统战思想形成与发展的第三、第四阶段。

《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原是聂荣臻撰写并于1939年1月送交中央的关于创建晋察冀边区的军事报告,随即得到指示修订成书,于同年5月交八路军军政杂志社正式出版,在延安和重庆两地公开发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聂荣臻分别作序。正文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晋察冀边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创建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概述边区在开辟、创建的过程中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战况,有详细的数字统计。第三部分,主要述评1938年9—11月,边区军民反围攻斗争取得胜利的经过。第四部分,总结边区抗战经验,聂荣臻在对边区敌后抗战六条经验进行具体论述后,有一个精要的概括:“就因为我们高举着鲜明的民族自卫战争的旗帜,掌握着统一战线的武器……获得军、政、民的高度合作与民众的热烈的帮助。”^[12]边区经过一年的“民众大联合”、有效的游击战,在敌后建立起三省72县、周边10万平方公里、1200多万人的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毛泽东对此书的两处评价尤其值得重视:其一,毛泽东在1939年3月18日《致聂荣臻》的信中,称赞这本书“是十分宝贵的”,并告之“书准备在延安、重庆两处出版”,他与王稼祥主任“各作一序”的中央安排^[1]。其二,毛泽东在序中说:“晋察冀边区是华北抗战的堡垒”,“聂荣臻同志的这个册子,有凭有据地述说了该区一年半如何实行三民主义与如何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不但足以击破汉奸及其应声虫们的胡说,而且足以为各地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如何唤起民众以密切配合抗战的模范。”^[1]不言而喻,《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

区》这本军事报告之所以“十分宝贵”,是因为其以实践理性陈述、概括的边区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经验,作为“事实论据”有力论证了毛泽东统战思想的亲和力、号召力、创造力与战斗力,以及其在抗战初期引领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的大政方针于华北抗日根据地有效践行的非凡价值。朱德的序言也高度评价了晋察冀边区成功创建的意义:“它起着在今天配合全国主力之出击,成为反攻敌人之最前线的有力阵地之伟大作用。”^[12]

《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是彭真1941年4月调中央工作后,于6月4日—8月21日,在延安分七次向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汇报晋察冀边区工作的报告,随后编印成书,作为党内文件于1944年11月在各抗日根据地出版。这个报告以1937年11月至1941年2月,晋察冀边区贯彻执行党中央政策的实际情况和基本经验为工作总结的事实依据。报告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各项具体政策”7章,下部“党的建设”。上部“政权建设问题”包括9个方面:建设政权;边区政权改革的阶段特征;边区政权建设的阶段问题;边区各级政权的组织机构;各阶层“普选”中的斗争;各阶层人民政治地位选举结果的体现;政权“三三制”的执行;普选中的具体工作;关于边区政权性质的结论^[13]。9个方面内容的逻辑关系很清楚:先提出晋察冀边区政权建设核心经验的概括论断,然后回顾边区政权建设经历的改革阶段、分析现阶段边区政权建设存在的问题,介绍目前边区实际存在的各级政权组织机构,回顾边区各级政权普选中存在的阶层斗争事实,比较普选后各基层政治地位的变化,评估政权“三三制”执行情况,最后得出边区人民政权的政治属性,工作总结经验理性的思维方式应用很典型。笔者认为,彭真报告重点分析的首先是晋察冀边区各阶级、阶层抗战中的政治动向,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性与党中央各项政策坚定执行的必要性,强调党在边区确定具体政策时应坚定不移地遵循统一战线建设基本原则的认知。彭真有关晋察冀边区确定具体政策统一战线基本原则的提出,依据的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的政治文化理论,而不是抗战初期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的统战经验。彭真于1940年9月1日主持晋察冀北方分局扩大会议时也阐述过这个意思。有研究者指出:“密切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地解决边区的具体问题,是彭真活用毛泽东统一战线基本原则的根本所在。”^[4]这个评价无疑是正确的。其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注意到毛泽东统战思想发展的第三阶段与第四阶段实际存

在的区别,因为党的路线及其各项政策核心精神的掌握,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精髓的实际领悟,而毛泽东文化哲学著作是其思想精髓权威表述的载体。1937年11月至1938年11月晋察冀边区统一战线的建设,还没有《新民主主义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论政策》等体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统战思想的系列著作,这是研究者应该留意的。特别是《新民主主义论》的横空出世,对中国革命政治与文化的战略关系做了透彻的阐释,并提出“统一战线的文化”概念。笔者非常认同学界对这个概念精深内涵的点评:“统一战线”归属于政治思想的一种知识类型,提出“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概念,说明毛泽东统战思想有了“跨领域的扩展”,不但明确延伸到军事、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各领域,同时保留强烈的政治文化色彩。“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知识概念,当然属于文化领域,但无论从字面上还是内涵上,都渗透着深刻的政治意义,这成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的理论特色。“毛泽东将政治和文化综合起来,统一于‘统一战线’,不能不指出,此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同时,通过这一综合,揭示了整个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统一战线文化的特质。”^[14]

总之,《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与《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两个报告,在内容上既有密切关联又有明显区别:归根到底都是有关边区统一战线经验的总结,都涉及毛泽东统战思想的践行,但其写作的时间不同,写作的视角不同,经验理性站位的审视层面不同,其历史文献价值是不应该混淆的。

四、聂荣臻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德治”实践

关于聂荣臻抗战时期在晋察冀边区的德治实践是一个崭新的学术课题,难度之大从其涉及的德治系列相关难题即可感受到。如德治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问题,学术考察聂荣臻德治思想与德治实践的文献依据问题,抗战初期与进入相持阶段后聂荣臻德治实践的联系与区别问题,聂荣臻德治思想与毛泽东统战思想关系的认识问题,聂荣臻德治实践与毛泽东统战思想关系的认识问题等,因为当下文献检索的结果,除了核心概念“德治”之外,其他文献几乎都是空白。就笔者翻阅文献的印象而言,“聂荣臻德治实践与毛泽东统战思想的认知关系”,是比较阅读《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与《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两篇文献之

后的重要发现。

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肯定团结救国的必要,也清楚表明了其抗日立场:“集中整个民族力量,自卫自助,以抵暴敌,挽救危亡。”这表明,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标志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因此得到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及时指出,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但我们很清楚,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共同抗战,关联着政治属性根本不同的两个政权、两种军队,有关合作的政治纲领与组织形式事实上无法一致,而不得不选择“没有成文,不要固定,遇事临时商量”的形式^[15],这当然给创建初期的晋察冀边区造成了很大困难。把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统战思想创造性地自主应用于晋察冀边区建设,这个写作意图在彭真的报告中处处得到体现,在此不用赘言。抗战时期在晋察冀军事为主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工作中,从三民主义抗战建国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建构,对毛泽东统战思想的深刻领会与自觉应用,不仅体现在聂荣臻的报告中,在《聂荣臻军事文选》《聂荣臻回忆录》《聂荣臻年谱》等文献中同样得到体现,这是聂荣臻研究历史文献梳理下一步特别需要探讨清楚的问题。这与聂荣臻主要作为军事领导人在边区错综复杂的各类问题处理中,自觉践行“德治”精神分不开,因为在边区,聂荣臻始终把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作为首要工作常抓不懈,全面、有效、创造性地践行毛泽东统战思想。

笔者认同关于德治的如下见解:我国历史上德治的国家治理方式,早在中国社会统治思想诞生之日起就开始践行了,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经典理论的阐释,对于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德治是影响深远的。虽然毛泽东从未“直接用过‘德治’这一概念,但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和全部社会实践活动中,始终贯穿着‘德治’精神”^[16]。毛泽东德治思想的“民族性”,主要体现在中国传统德治思想底蕴的传承方面,国家、社会与区域的治理,“以文化人”“为政以德”为其核心价值取向;毛泽东德治思想的“革命性”,主要体现在推动中国历史德治思想的“革命性变革”,以马列主义的革命道德彰显其“鲜明的阶级立场”;毛泽东德治思想的“实践性”,则是在中国现代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建构生成的,在社会革命实践中“运用和推广”的^[16]。

笔者始终认为,聂荣臻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德

(下转第28页)

府认可后纠纷终结”。不难发现,此种治理方式同样没有回避老人的积极作用,同样注重运用民间力量息讼止争。

四、结语

民间纠纷解决机制所反映的价值取向正是官方的倡导与王法的追求,乡民在试图建立起自治性质的解纷机制的过程中必须尊重官方权威、遵从王朝法典^[8],《教民榜文》确立的带有自律与裁判性质的老人制度正是民间期许与官方信任和谐统一的产物。在有明一代长期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老人作为乡村圣贤自始至终都是调处乡土纷争、维护乡土秩序的中坚力量,这既有“乡里社会的特定性决定了乡民的习惯意识、宗族意识和村落意识远胜于国家意识”的原因,也有“州县官主要关注钱粮赋役的征收;州县司法更重视危害统治权威的刑案而视户婚田土等为‘细故’”^[9]的原因。老人由主导到辅助的地位转化展现了明代乡土社会治理路径的全貌,虽然老人制度走向衰落,但不应就此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换言之,老人制度的功能定位与运转程式足以说明,乡民自治与官府控制一直保持着多元理性的内在张力,兼容乡土、官方、法治与情理多种

面向的良民之治有效保障了明代统治者殷切期盼的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 [1] 一凡藏书馆文献编委会. 古代乡约及乡治法律文献十种(第1册)[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88.
- [2] 张晋藩. 中国法制通史(第7卷)[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1-12.
- [3] 韩秀桃. 中国古代乡里基层组织特征[J]. 法学杂志,1998(1):32-33.
- [4] 王钰欣,周绍泉.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1卷)[M].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
- [5] 中岛乐章. 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以徽州文书为中心[M]. 郭万平,高飞,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 [6]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 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1辑)[M]. 成都:巴蜀书社,1999:200.
- [7] 王钰欣,周绍泉.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2卷)[M].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320.
- [8] 韩秀桃. 明清徽州的民间纠纷及其解决[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183.
- [9] 韩秀桃. 《教民榜文》所见明初基层里老人理讼制度[J]. 法学研究,2000(3):146.

[责任编辑 文 川]

(上接第9页)

治实践的思想根源,在于毛泽东统战思想内涵的德治精神,当然还需要充分占有史料,以理服人深入论证。不过这是下一个研究项目的选题,有待另文展开了。

参考文献:

- [1] 刘庆礼. 聂荣臻的《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J]. 文物春秋,1998(1).
- [2] 聂荣臻.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J]. 军事史料,2015(3).
- [3] 聂荣臻. 关于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基本经验[J]. 军事历史,1984(3):2-7.
- [4] 沈雁听. 彭真在晋察冀边区贯彻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贡献[J]. 党的文献,2003(6):63-68.
- [5] 段星. 聂荣臻对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卓越贡献[J]. 军事历史研究,1999(4):16-23.
- [6] 黄艳. 聂荣臻对创建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的贡献[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95-99.
- [7] 余雪松,王清荣. 聂荣臻与晋察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311-

313.

- [8] 聂荣臻. 聂荣臻回忆录[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 [9] 兰桂萍,陈洪. 聂荣臻对晋察冀边区文化建设的贡献[J]. 重庆社会科学,2014(4):73-79.
- [10] 黄绣芸. 聂荣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践行与发展[J]. 文学教育(下),2016(6):163-165.
- [11] 张德明. 毛泽东统战思想特征及其启示[J]. 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27-29.
- [12] 赵丽洁. 珍档探秘:《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J]. 档案天地,2009(7):24-27.
- [13] 吴晓静. 彭真的《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J]. 文物春秋,2009(2):75-77.
- [14] 刘松茂,洪汛. “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的提出与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成熟[J]. 湘潮(下半月),2013(2):2-3.
- [15] 袁永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J]. 传承,2008(10):10-11.
- [16] 朱修国. 论毛泽东“德治”思想[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2(1):52-56.

[责任编辑 文 川]